

县级人大代表履职：谁更积极？

黄冬娅 陈川懿

提要：利用 2013—2014 年全国县级人大代表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及其影响因素，以“议案和建议数”以及“是否投过反对票或者弃权票”来测量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本文发现：第一，选举激励对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有重要影响，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县级人大代表往往并非为了谋求连任而积极履职，相反，他们更可能是为候选人提名和正式选举阶段所形成的公民授权的认知和积极履职的道义责任感所激励。第二，政治身份对代表的履职行为有混合影响，在提出建议议案上，领导干部更为消极，专职代表更为积极，但同时党员代表却更可能投过反对票。第三，是否投过反对票与人大代表的政权支持程度和政策满意度并无显著相关性，它更多地反映了代表的权威主义价值认同。第四，人大代表积极提出建议议案的动力机制与投票行为的动力机制存在相当的差异，提出更多建议议案的人大代表并非就更倾向于投出反对票和弃权票，反之亦然。

关键词：人大代表 履职积极性 选举激励 政治身份 政治态度

在已有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中，除了对人大的正式制度以及选举过程的介绍和分析以外（蔡定剑，1992，2002；史卫民、雷競璇，1999），许多研究者往往将议题聚焦于正式制度框架下人大机构自身的演变，特别是地方人大的发展。研究者力图发掘地方人大如何拓展政治空间以加强其对于“一府两院”的监督。在这些研究中，地方人大被认为是通过“政治嵌入”而非争取“自主”和“对抗”来获取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嵌入”包含了建立信息网络、磨合和强化自身能力等各种策略（O'Brien，1994a；Xia，1997，2000）。乐观的判断认为，在人大有限自主性和人大代表缺乏选举联系的情况下，地方人大仍然发挥了相当的监督作用，已经不再仅仅充当“橡皮图章”（Cho，2002，2003a）；而相对保守的判断则认为，虽然地方人大的能力有一定的发展，包括人大预算监督已逐步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是地方人

* 本文受国家 985 工程三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40）和中山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育项目资助。

大仍然深嵌于体制之中,面对诸多挑战和困境(O'Brien & Luehrmann, 1998;林慕华、马骏,2012)。

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人大代表的角色在不断转变,不再消极履职或者仅仅充当“国家代理人”,而是积极反映民意,监督政府和提供政策建议(O'Brien, 1994b; Manion, 2014a; Cho, 2009)。然而,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在不少代表开始积极履职的同时,许多代表仍然表现得十分消极。什么因素影响了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本文使用最新的全国县级人大代表调查数据,在界定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与代表性关系的基础之上,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现状如何?第二,影响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因素何在?

一、文献评述

(一)人大代表履职:萌芽的代表性?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虽然人大代表会反映公众意见,也不断给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由于授权并不来自选民,因此,他们更多地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欧博文就认为地方人大代表扮演了三种角色,即消极的人大代表、国家代理人和谏言者。在欧博文看来,谏言者更关注选民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的利益。不过,即便是谏言者,他们也往往同时承担了国家代理人的职责,上传下达各种国家政策。当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和谏言者的角色重合时,人大代表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O'Brien, 1994b)。麦克法夸尔也认为,地方人大代表常常扮演申诉官的角色。这种申诉官并非是政府的反对者,相反,他们既给政府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忠诚于现有体制(MacFarquhar, 1998)。

最近的研究与这些研究不同,试图证明地方人大代表履职越来越积极,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议案和建议。并且,在研究者看来,这反映了人大代表萌芽的代表性,他们正从国家代理人逐渐转变为真正的民意代表。赵英男指出,地方人大代表已经不再将自己当作国家代理人,相反,他们经常扮演公众监督者、意见反映者和政策提供者的角色。并且,他们不仅关注公共利益,而且还开始代表特定社会阶层和地区的利

益。兼职代表制下，地方人大代表往往关注与其所在的地区、职业和社会阶层相关的问题，他们常常把自己当作是“农民的代表”、“私营企业主的代表”或“妇女的代表”等。甚至官员代表都会把自己当作是特定领域的代表，比如，公安部门的代表、交通部门的代表和法院的代表(Cho, 2003b)。而墨宁则试图证明，地方人大代表已经开始具有了选民意识，他们在角色认知和履职行为上都开始代表地方选民。在安徽省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她提出，在角色认知上，地方人大代表，特别是县级人大代表，大部分都赞同人大代表应该与选民保持一致；在履职上，超过一半的代表认为最重要的职责是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只有不到2%的代表认为最重要的职责是上传下达；代表各种反映民意的活动频数也相当高，地方基础设施问题、农村发展、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是人大代表反映最多的问题。在墨宁看来，人大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反映所在地方(选区)的利益诉求。因此，墨宁提出，地方人大代表已经具有了显著的“地域回应性”(Manion, 2009, 2014b)。

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究竟何种因素推动了人大代表积极反映社会的各种诉求。在西方民主体制中，议员被假设为争取再当选的理性行动者，选举激励被认为是约束议员代表选民最重要的因素。再当选的激励使得议员倾向于迎合大部分选民的偏好和意愿，从而有效地约束了议员的行动，促使他们投入到选区服务之中(Mayhew, 1974; Bianco et al., 1996; Katz & Sala, 1996)。反之，如果议员打算退休，或者要争取更高层次的职位而不再面对现在的选民，他们往往会选择逃避选区服务，更少地关注选区，更少地参加唱名投票(Rothenberg & Sanders, 2000)，同时，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关注立法议题(Herrick et al., 1994)。直接选举和选票差幅也对议员行为有直接影响：直接选举会强化议员回应选民诉求的激励(Meinke, 2008)；同时，根据选票差幅假设，从竞争激烈选区产生的议员以及那些在选举中以较小选票差幅胜出的议员会对选民诉求更加敏感(MacRae, 1952)；此外，除了实际的选票差幅之外，对于选票差幅的主观判断也会影响选举联系(Fiorina, 1973; MacRae, 1952)。在控制党派身份和选民构成变量的情况下，在上一次选举中选票差幅小的议员较之于差幅大的议员更倾向于回应和迎合选民的诉求(MacRae, 1952)。虽然有的研究认为，选举竞争性和议员回应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并且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但是，它们都不否认竞争有助于促进回应性(Campbell, 1981)。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竞争性受到一定的限制,选举常常被看作是自上而下政治吸纳的过程,而非自下而上政治参与的过程(Dickson, 2000, 2003, 2007; Sun, 2014)。因此,通常认为选举并不会催生选举联系。欧博文就认为,人大代表会反映民众诉求,但是,这并非由于民众控制了他们的政治命运(O'Brien, 1988)。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何种因素可以推动人大代表积极表达民众或者选民的诉求? 现有研究认为主要是四方面的因素。

第一,选举激励。与欧博文的判断不同,墨宁一直试图揭示人大代表选举中蕴藏的竞争性。在她看来,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并非完全没有竞争性,正是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而非其他因素)催生了地方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在她看来,中国选举制度力图结合选民选举的偏好和政党选择的偏好,候选人不能只靠政党的支持胜出,还需要赢得选民的支持(Manion, 2000)。在较早的研究中,墨宁就提出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可以催生选举联系,即村委会领导与普通的村民具有一致的观点和立场。她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这并非源于共享的环境、非正式的影响或者社会化,而是选举联系所致(Manion, 1996)。就人大代表选举而言,她认为,虽然选举竞争性有限,但是选举激励推动了代表性(Manion, 2009)。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她进一步提出,虽然党组织试图主导选举进程,但是选举竞争性仍然存在,在直接选举中选举竞争更激烈,这直接导致了地方人大代表的“地域回应性”。在这种地域回应性中,选举的提名方式对代表的类型产生重要影响,经选民提名而当选的人大代表一般是那些能够代表地方利益的人,如长居当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主任等等;而党组织提名当选的人大代表更多是各类党政官员(Manion, 2014a, 2014b)。

郭继光的看法与墨宁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他认为,选举联系的确推动了代表性的发展,但这种选举联系来源于社区压力而非再当选压力。他的研究发现,只要代表真正地由选民提名和选举产生,那么,不管代表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还是干部,他们在立法参与中都会更加积极。不过,他认为,再当选的压力并非很重要,因为代表不是全职的职位,代表从中并不会获得太多回报。相反,社区压力,即代表在社会交往中与社区成员的密切互动,使得他们不得不代表选民表达其诉求(Guo, 2007)。

第二,身份背景。寻求连任的激励还必须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来考

虑。首先是党派身份。在西方民主体制中，议员往往不得不依靠政党来获取竞选中的胜利，因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往往坚持政党立场而非本选区的选民立场(Swift, 1987; Studlar & McAllister, 1994)。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由于大部分代表实际上都由党团提名产生，党员身份的影响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次则是职业背景。有研究认为，官员代表更加关心现有政权的稳定性以及精英利益(Xia, 2007)；官员身份直接影响到了监督权的行使，特别是戴帽产生的人大代表，他们履职的积极性最低(杨云彪, 2006)。赵英男则认为，工人和农民代表更多地扮演民意反映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而知识分子和干部代表则更多地扮演政策提供者的角色，企业家代表则更多地关注经济等相关问题(Cho, 2003b)。最后则是专职与否。人大代表专职还是兼职也被认为与其履职行为有密切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代表兼职会使得对其履职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兼职代表履职不够积极，也难以有效地反映民意(邹平学, 2008; 王利民, 2007)；同时，由于角色的冲突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兼职代表制下也可能出现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兼职代表可能会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谋取私利(龙太江、龚宏龄, 2010)。

不过，究竟身份背景与人大代表履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以及分析对象的不同，有时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数量的分析发现，非中共党员的代表提出的议案数量要多于中共党员的代表，非官员代表提出的议案数要多于官员。而且，在非官员代表中，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民间组织的管理者和专业职称技术人员是提出议案较多的三大群体(何俊志、刘乐明, 2013)。而对北京乡镇人大代表的分析结果却显示，干部代表和党员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书面意见和评议活动的开展方面有较好的绩效(何俊志、王维国, 2012)。

第三，政治态度。选举联系的研究将议员当作受再当选机制驱使的理性政治行动者。然而，当我们讨论中国人大代表问题时，由于选举联系本身的制度约束性相对较弱，因此，政治态度就可能对人大代表产生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那些更具公民意识的代表会更倾向于反映选民或者社会诉求，尽管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回报，也不会因为忽视选民和民意诉求而受到惩罚(Xia, 2007)。

第四，个人特征。代表的个人动机、素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

对代表履职也产生了影响。“素质论”是关于中国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观点。人大代表往往被认为由于素质不够而严重影响其履职能力(桑玉成、邱家军,2007)。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数量的分析发现,年龄大的代表、学历高的代表相对较为积极,其中,女性代表提出的议案要多于男性代表,大专学历的代表是在各个学历层次中提出议案最多的群体(何俊志、刘乐明,2013)。对北京乡镇人大代表的分析显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和男女比例并不构成乡镇人大履职绩效高低的必要条件,有较多年龄大的代表的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提出书面意见和评议活动则较为积极(何俊志、王维国,2012)。

(二)对既有研究的批评

现有研究无疑有相当的理论 and 现实洞察力,对我们理解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提供了多种解释。然而,已有研究也有不少的局限性。

第一,到目前为止,由于问卷调查渠道的限制,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地方人大代表的全国性调查问卷。现有研究往往要么以对人大代表定性访谈的资料(O'Brien,1994b;Cho,2003b;Guo,2007)为基础,要么以个别省份的抽样调查(Manion,2009,2014)为基础,它们都未能充分地将理论所揭示的包括连任意愿、选举竞争性和政治态度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到分析模型中。

第二,关于选举激励。墨宁的研究揭示了选举激励的作用,然而她并没有分析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和代表连任意愿的差异是否影响到了代表的履职行为(Manion,2014a,2014b)。同时,尽管她揭示了党组织提名的代表与选民提名的代表在类型和“代表性”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在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不少地方把县区党委“戴帽”下达的代表候选人(通常是县区党委、人大、政府主要负责人、人大常委等)以党组织的名义提名,而其他代表候选人则大多数以选民的名义提名,也就是说,这些以选民名义提名的候选人大部分也是党组织安排的(史卫民,2000)。因此,为了分析选民在候选人提名中的参与是否真正影响到了代表的履职行为,我们需要区分区县党组织“戴帽”提名的代表和基层党组织提名的代表,也需要区分党组织以选民名义提名的代表和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并在控制代表类型的条件下检验代表提名方式是否仍对代表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第三,关于政治身份。现有研究虽然普遍认为兼职代表制会导致

代表的履职积极性不足,但这一结论仍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特别是缺乏大样本数据的支撑。同时,对于官员身份和党员身份对行为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矛盾,因此,我们仍有必要通过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政治身份与代表履职积极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四,关于政治态度。西方选举联系的文献往往把议员假设成为追求连任的理性行动者,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下追求连任,因此,这些研究基本上不考察议员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然而,对于我国的人大代表而言,并没有强大的制度去约束人大代表积极履职,代表的政治价值观也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异,因而政治态度更可能会对代表履职的积极性产生影响。目前,关于人大代表履职行为的研究大部分是利用代表构成数据和建议议案情况来进行分析,无法检验政治态度对于代表履职的影响,墨宁的问卷调查也没有设计政治态度的相关题项(Manion, 2014a)。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检验政治态度对代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关于投票行为。在考察代表履职积极性时,有的研究分析了代表提出议案建议的行为,有的则分析了闭会期间代表提出书面意见和评议活动的情况。然而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分析代表在表决或选举中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行为。因此,本研究将为代表的投票行为提供理论解释。

此外,在近年来关于人大代表履职行为的研究中,人大代表更积极地履行职责和反映民意诉求往往被理解为日益具有“代表性”,人大代表被认为是不再充当国家代理人,而在认知和行为上都逐渐都更加倾向于代表民众或者选民的利益(Cho, 2003b; Guo, 2007; Manion, 2014a)。在本文看来,这些研究结论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方面,角色认知与履职行为两者之间不一定具有一致性,两者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最近的研究往往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在态度上和行动上都倾向于代表民意。但实际上,具有强烈代表意识的人大代表可能履职并不积极,因为他们可能由于更清晰地认识到体制的局限而采取更消极的立场;反过来说,部分人大代表更加积极履职和反映民意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代表意识”,可能是各种制度激励和个人利益表达的诉求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履职。另一方面,人大代表的积极履职也并非一定意味着其“代表性”的逐渐发展。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下,议员的“代表性”的衡量标准往往是议员的日常选

区服务和在投票中是否采取了与选民一致的立场。而对于人大代表而言,判断其履职行为是否代表了民意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基本上无法判断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以及他们的日常监督和投票行为是否与民众或者选民的立场一致。正如有的研究所发现的,虽然人大代表开始表达各种利益诉求,但是,他们有时不过是表达自身的观点,甚至利用代表身份为自己谋求个人利益(Gandhi & Lust - Okar, 2009; He et al., 2007; Truex, 2014)。因此,本文将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与“履职行为”区分开来,并将代表履职行为的“代表性”与“积极性”分离开来。

二、研究设计

(一)抽样设计

本文选择县级人大代表为研究对象,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两个考虑,一方面,由于调查渠道所限,本研究难以对全国和省市三级人大代表进行调查;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发现,人大代表层级对于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和履职行为具有影响,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更倾向于积极地反映民意(Manion, 2014a, 2014b)。

本次调查在2013年9月到2014年1月间完成,是目前唯一的全国县级人大代表调查问卷。在前期定性访谈和预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委托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贵州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的合作者协助完成具体的问卷调查。由于与其他精英调查一样受到调查渠道和方式限制,问卷调查全部在县区人大的允许和协助下进行,并最终通过三种途径发放,即县区人大开会期间、县区人大代表小组活动期间以及乡镇人大和街道人大工委专门组织代表填写完成问卷。大部分问卷实行当场发放和当场回收,部分在人大开会期间发放的问卷,由人大代表带回住宿地填写,开会时返回。五所大学派出调查员负责问卷发放,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派出的督导负责控制问卷调查质量。为了避免官方问卷调查渠道所造成的问卷填写中的自我审查问题,我们在问卷首页明确提示,除了调查机构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法开启问卷信封并获取相关问卷信息和数据。

本次调查的抽样过程如下:

第一,抽样框建立。由于无法获取县区人大代表数的基本数据,我们根据县区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估算各个县区人大代表数(最少120名,人口每增加5000人增加人大代表1名,最多不超过450名,以各县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并推算出每个省的县区级人大代表总数。

第二,抽样。本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PPS抽样。按国家相关规定,将省级行政区(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部省份三个层次,然后在每层中独立采用三阶段PPS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阶段,在每一层首先以省作为第一抽样单元(PSU),各省按照GDP(2011年)排序,将各省累计县级人大代表估算数作为抽样依据等距抽取两个省;第二阶段,将所抽取出来的省份下辖县区按照非农人口比例排序,将各县区县级人大代表估算数作为抽样依据等距抽取三个县(或区);第三阶段,从每个中选县(或区)人大代表中随机抽取代表70人。由于西部省份里中选的内蒙古自治区因进入渠道完全受限无法实施调查,所以设计样本覆盖了除内蒙古自治区外的5个省级单位的15个县(或区),共1050个样本。

第三,加权。考虑到实际执行的情况,加权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层内加权。对每一层而言,如果第三阶段在抽取具体的人大代表时都抽取70人,则由PPS抽样的特点可知,层内每个样本的中选概率是相同的,不需要加权处理。实际操作中,为保证有效样本数在70以上,需要用随机抽样抽取高于70的样本,甚至全查,以保证有效样本数。这样去掉拒访的样本,基本可以保证回收样本数达到70人的要求。但这样操作实际上改变了样本的中选概率,因而需要加权来校正样本的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将每一中选县区的样本个数加权至70个样本的代表性,因而可以确定层内中选县区中选样本的权值为: $iw = \frac{70}{m_i}$, m_i 表示中选县区收回的有效样本数。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是层间加权,由于每层独立进行三阶段PPS抽样,每层累计的人大代表总数不同,导致层间的样本中选概率不同。并且,内蒙古自治区因为最终无法获得调查途径而调查失败。为此,需要在层间进行样本加权处理,以校正样本的代表性,从而保证数据分析在整体推论上的科学性。层间加权的权值如表1。根据以上分析及权值计算,总体推论需要的综合加权值可由如下公式计算: $tw = iw \times hw$ 。下文使用的数据是经过加权处理的结果。

表 1 层间加权

层名称	层内累计 测算代表 总数(人)	1050 个样本 的层间配 额数(人)	抽样设计 回收样本数 (人)	层间权值 $hw = \frac{1050 \text{ 个样本的层间配额数}}{\text{抽样设计回收样本数}}$
东部省份	234523	406	420	.966666667
中部省份	192384	333	420	.792857143
西部省份	179505	311	210	1.480952381
全国累计测算 代表总数	606412	1050	1050	
抽样设计回收 样本数	1050			

(二) 履职积极性:测量与描述

目前,人大代表履职涵括了很多方面,包括议案、建议、评议、询问和质询、投票以及考察和视察等。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从不同侧重点来分析人大代表履职状况。比如,何俊志和刘乐明(2013)曾经以议案的数量来考察代表的履职状况;墨宁从三个方面分析履职状况,即人大代表个人认知的履职职责、人大代表报告的各种活动的频数均值以及议案建议等反映问题的具体内容(Manion, 2014a, 2014b);赵英男将各种履职行为划分为三种,即监督、反映和政策提供(Cho, 2003b);郭继光则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评议、询问、质询、投票和视察等各种行为(Guo, 2007)。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测量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第一,代表本届以来领衔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总数。两者的总数越多,表明代表表达意见和建议越积极,有着更高的履职积极性。第二,代表是否曾经在人大会议上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在人大会议上对工作报告、预决算案以及人事任免等事项投弃权票或反对票意味着代表在表达对某些工作或某些领导干部的批评和不满,因而也反映了代表在表达批评意见上的积极性。

从这两方面来测量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主要考虑如下:第一,评议、视察调研和接访等代表活动更容易受到不同地区人大不同的组织安排影响,相对而言,提出议案和建议以及投弃权票或反对票更多地与人大代表个人的行为选择相关,反映了代表个人的积极性。第二,由于

我们很难判断实际议案和建议的具体内容究竟“代表”了谁,因此,本文只通过议案和建议的数量来考察代表履职的积极性,而不去探讨代表是否真正代表民众反映问题。第三,由于无法获取人大代表实际投票的数据资料,现有研究较少分析人大代表的投票行为,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优势,分析人大代表在调查中报告的投票行为,从而人大代表履职行为研究增加新的内容。

表2 是被调查县级人大代表本届以来领衔提出的议案建议数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到,少数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数远超过平均值,为了避免这些极端值的影响,我们把议案建议数进行了5%缩尾处理(winsorize),即把5%以下和95%以上的分位数分别替换为5%和95%分位数,这样既避免了极端值的影响,又不会丢失样本。其描述性统计量也如表2所示。

表2 议案建议数及其常用对数(lg)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观测值数
代表议案建议数	0	64	2.709	3.300	889
代表议案建议数(winsorize)	0	8	2.522	.074	889

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情况如表3所示,在有效填答的样本中,22.4%的代表曾经投过反对票,31.6%的代表曾经投过弃权票。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代表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问卷是通过官方渠道发放,对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比例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表3 反对票和弃权票

		反对票			弃权票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值	没有	535	50.9	77.6	471	44.8	68.4
	投过	154	14.7	22.4	218	20.7	31.6
	总计	689	65.6	100.0	688	65.6	100.0
缺失值		361	34.4			34.4	
总计		1050	100.0			100.0	

(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将主要分析三组自变量对于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影响,包括选举激励、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这三组自变量将被逐步放入回归模型中。同时,本文还控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水平以及是否连任等变量。

1. 选举激励

选举激励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从文献评述中可以看到,已有研究认为选举的竞争激烈程度和连任意愿是选举激励最重要的要素。考虑到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提名环节的重要性,本文将从三个层面测量选举激励,一是代表主观认知的提名方式;二是代表感知的选举竞争激烈程度;三是代表的连任意愿。

第一,代表主观所认知的当选本届县级人大代表的提名方式。我们假设,认为自己是“代表提名”的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会更高。问卷中的问题是“请问您当选本届县级人大代表的提名方式”。本题共有5个选项,“上级党组织‘戴帽’下达”、“本级党组织直接或通过主席团提名”、“本级党组织通过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选民自主联名提名”和“不清楚”。填写上述选项的代表分别占5.0%、9.0%、37.3%、45.1%和1.4%,另有2.3%的受访者没有填答。我们将填答“不清楚”的受访者和未填写的代表的该变量取值处理为缺失值。考虑到在实际过程中,选民提名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45.1%的代表认为自己是选民自主提名,这个比例显然会高于实际的选民提名比例。由于人大代表有可能并不清楚自身获得提名的方式并选择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选项,因此,这个“提名方式”实际上是代表主观认知的提名方式。

第二,代表感知的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虽然大部分的代表一旦获得提名就能够顺利当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潜在竞争。由于我们无法知道实际的选举竞争激烈程度,无法了解差额选举比例和选票情况,所以,本文使用人大代表对于选举竞争程度的主观判断作为变量。答题者被要求对此次选举是否激烈做出评价。供选择的答案依次为“不太激烈”、“一般”和“比较激烈”,有效填答的样本分别占8.1%、52.9%和39.0%。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取值越大说明代表认知的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上面的数据显示,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有不少代表反映选举的竞争比较激烈。

第三,代表的连任意愿。我们询问代表“是否希望下届连任”,选项分别是“不希望”、“无所谓”、“希望但顺其自然”和“希望并积极争取”,有效填答的受访者分别占 2.8%、5.6%、42.3% 和 49.4%。该变量也是定序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代表的连任意愿越强。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有连任的意愿,但有的代表会积极地争取连任,另一些则顺其自然。

2. 政治身份

如文献综述所示,政治身份是可能影响代表履职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代表的党员身份、行政级别和专兼职。因此,本文将考察县级人大代表 3 种相应的政治身份,包括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和专职代表。统计显示,在有效填答的受访者中,77.1% 的代表是中共党员;42.1% 的代表是领导干部,即拥有行政级别;20.7% 是专职代表。上述数据表明,人大代表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有相当高比例的代表是领导干部。此外,在兼职代表制下,兼职代表仍然占绝大多数,专职代表的比例很低。

3. 政治态度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优势,将政治态度相关的变量纳入到分析模型之中,将其作为另外一组主要解释变量。本文将从由高到低的三个层面来测量人大代表的政治态度,即一般的政治价值观、对现有政权的政治支持以及对政策的满意度。第一是权威主义价值。问题是“只要一个领导真正做到勤政爱民,为民做主,他/她是否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不重要”,答题者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5 个答案中进行选择。有效回答的受访者依次占 2.5%、23.3%、11.2%、36.3% 和 26.8%。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表明代表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越强。上述数据表明,过半数的代表有较强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他们并不太强调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第二是政权支持。本文用四个问题来测量回答者的政权支持,即“生活在现在的制度下我很满意”、“对于当前中国来说,稳定压倒一切”、“我觉得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护”和“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每个问题都有 5 个答案,即“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编码为 1、2、3、4、5。可以看到,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赞同度最高,均值为 4.48。对于“政府推行的价值观与我的价值观一样”的赞同度最低,均值为 4.08。这四

项的得分加总为“政权支持”的变量。

信度检测显示, Cronbach $\alpha = 0.831 > 0.7$, 说明这几个问题的内部一致性很好。如表 4 所示, 回答者的“政权支持”的均值是 17.05, 显示县级人大代表的政权支持程度相当的高, 同时, 标准差相对比较小。

表 4 政权支持程度

	均值	标准差	数量
生活在现在的制度下我很满意	4.29	.691	1041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 稳定压倒一切	4.48	.686	1036
我觉得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护	4.18	.745	1041
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4.08	.781	1028
政权支持(4-20)	17.05	2.368	1008

第三, 政策满意度。问卷用三个问题来测量人大代表的政策满意度, 分别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不同的政策领域, 即“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您对政府的政策较为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一说法的看法”、“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您对政府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卓有成效这一说法的看法”以及“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您对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这一说法的看法”。调查对象要求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5 个选项中选择, 它们分别编码为 1、2、3、4、5。从表 5 可以看到, 对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的满意度最高, 均值为 4.32。对环境治理的成效满意度最低, 均值为 3.53。这三道题的得分加总为“政策满意度”的变量。信度检测显示, Cronbach $\alpha = 0.756 > 0.7$,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调查对象总体政策满意度也较高, 均值为 11.43。

表 5 政策满意度

	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政府的政策较为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	1035	1	5	3.58	.938
政府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卓有成效	1039	1	5	3.53	.966
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	1041	1	5	4.32	.697
政策满意度(3-15)	1024	3	15	11.43	2.154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了已有研究中提到的各种人口特征,即代表的性别、年龄、民族和受教育水平。同时,我们还特别控制了代表是否是连任的代表。因为本次调查的县级人大代表都是在2011-2012年间换届的,而本次问卷调查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进行,调查对象在本届的任职时间大约为两年多。相对而言,连任代表任职时间更长,较之于新上任的代表而言,投票的机会更多,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此,我们控制了代表是否连任。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有效填答的样本中,女性占26.3%,男性占73.7%;25岁及以下的代表占0.3%,26-35岁的代表占11.7%,36-45岁的代表占39.2%,46-55岁的代表占36.7%,55岁以上的代表占12.1%;汉族代表占76.6%,少数民族代表占23.4%;0.1%的代表没受过正式教育,0.9%的代表为小学学历,13.2%的代表为初中学历,22.0%的代表为高中(职中、技校或中专)学历,23.1%的代表为大专学历,33.6%的代表拥有本科学历,7%的代表拥有研究生或以上学历;此外,40.5%的受访者是连任的人大代表。

(四)统计方法

议案建议数、反对票、弃权票、性别、民族、领导干部、专职代表、是否连任等变量具有较高比例的缺失值,缺失比例分别为18.2%、39.1%、39.2%、15.8%、14.7%、10.7%、7.7%和8.1%,为了提高估计的效率,我们使用多重插补法中的全条件定义法(Fully Conditional Specification, FCS)对上述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插补,其中对议案建议数的插补使用泊松回归模型,对其他变量的插补使用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产生了10组多重插补的数据。插补模型中包括了所有的因变量、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我们将用泊松回归模型对代表议案建议数进行回归分析,并用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对代表是否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将三组主要解释变量逐步放进回归模型,并在所有模型中放入控制变量。模型1是只加入“选举激励”这一组解释变量的结果,模型2中加入了“选举激励”和“政治身份”两组解释变量,模型3中则将“选举激励”、“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三组解释变量均加入了回归分析。

三、统计结果

各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在模型1中,主要解释变量是有关“选举激励”的一组变量,包括回答者主观认知的提名方式和选举竞争激烈程度以及代表的连任意愿。同时,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和代表是否是连任等变量的影响。如表6所示,回答者报告为“戴帽”下达、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和本级党组织通过选民提名这三种提名方式与议案建议数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也就是说,相对于主观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而言,主观认知为戴帽提名、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或本级党组织通过选民提名的代表倾向于提出更少的议案和建议。代表报告为本级党组织经选民提名与投过反对票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本级党组织通过选民提名的代表比主观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更少投反对票。人大代表的连任意愿也与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代表越希望连任,越不可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形成对比的是,回答者报告的选举竞争激烈程度与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都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也就是说,主观认知选举竞争越激烈的人大代表越可能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就控制变量而言,男代表更有可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p < 0.05$),年龄越大的代表越不可能投弃权票($p < 0.01$),汉族代表比少数民族代表更少提出议案建议,但更可能投弃权票($p < 0.05$),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代表更有可能投过反对票($p < 0.05$);连任的人大代表提出过更多的议案建议($p < 0.05$),也更可能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p < 0.05$)。

第二,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政治身份的一组变量。从表6可以看到,选举激励中各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仍然十分稳健,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此外,对于新加入的政治身份这组变量而言,领导干部与议案建议数呈显著负相关($p < 0.05$),领导干部更倾向于提出更少的议案建议。党员身份与投过反对票呈一定的正相关($p < 0.1$),也就是说,中共党员更有可能投过反对票。专职代表与议案建议数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也即他们比兼职代表提出了更多的议案和建议。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加入政治身份之后,性别与投反对票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但其他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比较稳健。

第三,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了政治态度这组变量。可以看到,选

表 6
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截距	1.151 ^{***} (.257)	-2.616 ^{***} (.934)	-1.448 (.907)	.970 ^{***} (.270)	-2.741 ^{***} (1.002)	-1.202 (.975)	.411 (.347)	-1.151 (1.275)	-1.484 (1.243)
戴帽下达	-.634 ^{***} (.164)	-.873 (.816)	-.561 (.752)	-.615 ^{***} (.177)	-.882 (.824)	-.653 (.781)	-.584 ^{***} (.177)	-.976 (.818)	-.628 (.795)
本级党组织 直接提名	-.468 ^{***} (.121)	-.451 (.366)	-.255 (.292)	-.424 ^{***} (.127)	-.510 (.370)	-.370 (.325)	-.385 ^{***} (.126)	-.561 (.379)	-.371 (.329)
本级党组织 经选民提名	-.193 ^{***} (.067)	-.635 ^{***} (.217)	-.230 (.208)	-.166 ^{**} (.069)	-.644 ^{***} (.227)	-.249 (.217)	-.159 ^{**} (.068)	-.646 ^{***} (.235)	-.221 (.222)
选举竞争 激烈程度	.005 (.051)	.769 ^{***} (.167)	.614 ^{***} (.164)	-.007 (.051)	.764 ^{***} (.170)	.607 ^{***} (.166)	-.024 (.052)	.795 ^{***} (.174)	.560 ^{***} (.168)
连任意愿	-.037 (.042)	-.535 ^{***} (.161)	.614 ^{***} (.164)	-.032 (.041)	-.546 ^{***} (.165)	-.316 ^{**} (.144)	-.048 (.043)	-.492 ^{***} (.172)	-.361 ^{**} (.149)
中共党员				.035 (.076)	.514 [*] (.293)	-.000 (.252)	.038 (.077)	.525 [*] (.291)	-.031 (.256)
领导干部				-.156 ^{**} (.079)	.061 (.232)	.339 (.285)	-.165 ^{**} (.082)	.046 (.235)	.363 (.297)
专职代表				.200 ^{***} (.074)	-.370 (.263)	-.116 (.252)	.188 ^{**} (.075)	-.322 (.265)	-.094 (.256)

续表6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议案建议数	反对票	弃权票
权威主义 价值							.012 (.024)	-.160** (.079)	-.076 (.075)
政权支持							.020 (.017)	-.040 (.057)	-.023 (.052)
政策满意度							.024 (.017)	-.060 (.063)	.103* (.059)
男性	.045 (.068)	.518** (.257)	.737** (.282)	.040 (.072)	.395 (.290)	.695** (.295)	.040 (.073)	.429 (.292)	.684** (.301)
年龄	.026 (.037)	-.079 (.128)	-.287*** (.105)	.027 (.037)	-.052 (.131)	-.281*** (.106)	.024 (.037)	-.053 (.133)	-.285*** (.106)
汉族	-.201*** (.072)	.103 (.289)	.904*** (.242)	-.215*** (.071)	.121 (.296)	.976*** (.243)	-.192*** (.071)	-.102 (.297)	1.050*** (.253)
受教育水平	.000 (.026)	.261*** (.094)	.004 (.077)	.038 (.029)	.221* (.114)	-.078 (.095)	.032 (.028)	.241** (.116)	-.076 (.098)
连任	.149** (.059)	.567*** (.227)	.408** (.177)	.149** (.059)	.526** (.231)	.397** (.182)	.159*** (.059)	.492** (.237)	.377** (.185)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举激励和政治身份两组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仍然非常稳健。而权威主义价值与投反对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p < 0.05$)，即代表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越强，越不可能投反对票。此外，政策满意度和投弃权票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关性($p < 0.1$)。代表的政策满意度越高，越可能投过弃权票。对于控制变量而言，相对于模型 2，模型 3 中各控制变量的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3 - 2014 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以“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数”以及“是否投过反对或者弃权票”来测量县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本文认为，现有研究过于强调“角色认知”和“履职行为”的一致性，并模糊了“代表性”和“积极性”的区别，而实际上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与履职行为并不等同。并且，由于我们难以测量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以及投票行为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因此，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数量的多少，以及是否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更多地是反映了其履职的积极性而非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聚焦县级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分析“选举激励”、“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三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对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影响。由于精英调查的难度和限制，实际的抽样调查仍然存在缺陷，因此，这里对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整体持谨慎的态度。不过，作为目前惟一的全国性人大代表调查，它也呈现出一些有意义的统计结果和理论发现。

第一，履职现状。本调查目前并不是历时性的跟踪调查，因此，无法比较县级人大代表履职是否“越来越”积极。不过，问卷调查仍提供了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些基本情况。从问卷来看，作为基层代表，县级人大代表履职比较积极，有 65.9% 的人大代表在本届任期内提出过建议，有 48.8% 的代表提出过议案，只有 19.2% 的代表没有提过议案或建议。此外，有 18.6% 的代表提出了 5 个及以上的议案和建议。与此同时，22.4% 的代表曾经投过反对票，31.6% 的代表曾经投过弃权票。这个比例也相当大，超出了预期。当然，县级人大代表履职的差异性也仍然非常显著。

第二，谁履职更积极？首先，关于选举激励，代表自我认知的提名

方式、自我认知的选举竞争激烈程度以及代表的连任意愿对其履职积极性产生了影响。对于代表的提名方式,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考察的是代表主观认知的提名方式,进而考虑到实际运作过程中“选民提名”往往是“本级党组织经选民提名”。因此,与墨宁将提名方式简单地分为选民提名和非选民提名不同,本文进一步细化了提名方式,除了“戴帽下达”和“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之外,还特别区分了“本级党组织经选民提名”和“选民自主联合提名”。数据分析显示,报告为上级党组织“戴帽”下达的代表、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的代表以及本级党组织经选民联合提名的代表都显著地比自我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的代表更少地领衔提出议案建议,主观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的代表也比本级党组织经选民联名提名的代表在投反对票上更为积极。而代表认为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他们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积极性就越高。此外,代表的连任意愿越强,就越不愿意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其次是政治身份。关于代表政治身份对于其履职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基于小样本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基于全国性抽样数据,表明领导干部代表较少提出议案和建议,而专职人大代表的确更可能领衔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议案。同时,数据也显示,中共党员代表更有可能投过反对票。

最后,关于政治态度。现有研究并未考察过代表的政治态度与其履职行为的关系。本文从权威主义价值、政权支持和政策满意度三个层面测量代表的政治态度。数据分析显示,政权支持对因变量都不发生显著影响;人大代表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对其领衔提出的建议议案数有显著的负相关,越认同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人大代表越不可能投过反对票;而政策满意度则与是否投过弃权票呈现显著正相关,即政策满意度越高的人大代表越可能投过弃权票。

综上所述,统计结果为我们呈现出几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发现。第一,选举激励对履职积极性发生作用的机制并不在于连任意愿。在西方议会选举中,寻求连任是选举联系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在回归分析结果中,人大代表的连任意愿对建议议案数不产生显著影响,且连任意愿越强的人大代表越不可能投反对票和弃权票,那么,相对于“戴帽”代表、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代表和本级党组织经选民联合提名的代表,为何自我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会提出更多的建议议案?其激励机制何在?

在本文看来,由于人大代表的连任更多地由官方来决定,选民很难了解代表的履职状况,也难以对其履职行为进行激励和惩罚,因此,人大代表的履职状况与其是否连任并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性联系;反过来,人大代表还可能为了追求连任而避免政治风险,从而更不可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在这种情况下,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可能并非是基于个人行动者利益最大化(连任)的理性激励,而更多地是来自选民的选举参与给代表带来的一种获得公民授权的认知和积极履职的道义责任感。一方面,真正得到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更能够意识到自己获得公民的授权,有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党组织经选民提名的代表,选民的参与也可能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主观上把自己归类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认为自己在提名过程中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因而他们也有公民授权的认知和积极履职的责任感。尽管从现实来看,主观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的比例过高,说明其中有部分代表可能实际上仍然是党组织通过选民联名提名的,但是,自我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提名的代表却都更倾向于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议案。

此外,就选举竞争性而言,一方面,按照选票差幅的假设,竞争越激烈,代表越可能更加回应和迎合选民的诉求;另一方面,在选举更多地是自上而下控制的情况下,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竞争越激烈,代表越可能迎合官方的意志。那么,究竟实际情况是何种逻辑?本文的统计分析表明,即便在党组织对代表连任产生关键影响的情况下,主观认知选举越激烈的人大代表越可能投出反对票或弃权票。代表自我认知的选举激烈程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代表在道义上的责任感,从而催生了选举联系。因此,人大代表越感知到选举的竞争性,越是认为选举竞争激烈,越可能增强代表积极履职以回报选民支持的意识。

第二,体制背景对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具有混合影响。本文的数据结果呈现了体制背景较为复杂的影响。相对于兼职代表而言,专职代表的确更倾向于提出更多的建议和议案,这表明专职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履行代表职责,因而也能提出更多的议案建议。同时,虽然“戴帽”下达是一种提名方式,但是,一般而言,戴帽代表多为上一级党政领导,因此也是体制背景的一种体现。数据结果显示,戴帽代表和领导干部的确较少提出议案和建议,这似乎表明体制背景对于履职积极性有抑制作用。但是,党员代表却更可能投过反对票,这与理论预

设有一定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目前党员身份本身对代表的行为并不形成显著的影响,但是,非党员在投票行为上可能更加保守和规避风险,因此造成了党员身份与投票行为的显著正相关。

第三,反对票并不能反映人大代表的政权支持和政策满意度,而往往与其权威主义价值认同显著相关。从理论假设而言,政权支持程度和政策满意度越低的人大代表更有可能投过反对票。然而,数据分析并不支持这样的理论假设,反而显示,人大代表投过反对票的可能性与其对于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对现有政权支持程度都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与代表的权威主义价值认同呈现显著的负相关。那些越认同权威主义价值的人大代表越不可能投过反对票。也就是说,人大代表是否投出反对票,更多地是根源于其主观的政治价值。同时,数据显示,对政策满意度比较低的人大代表反而更不可能投过弃权票,不过显著性相对比较弱($p < 0.1$),这个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它也反映出政策满意度低的代表并不会更倾向于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第四,议案建议与投票行为存在不同的激励机制。本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议案建议数和投票行为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差异。戴帽的、本级党委直接提名和本级党委经选民联合提名的代表比主观认知选民自主联合提名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更少,领导干部也比非领导干部提出的议案建议更少,但他们都并非更可能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同时,代表越认为选举竞争激烈,越有可能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党员也更有可能会投过反对票;而连任意愿越强的代表投过反对票的可能性则越小。但是,代表感知的竞争激烈程度、党员身份和连任意愿都不对议案建议数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人大代表积极提出建议议案的动力机制与投票行为的动力机制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提出更多议案建议的人大代表并非完全就是那些更倾向于投出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代表,反之亦然。这对于更好地理解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文献综述中所言,随着地方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数普遍增加,人大代表被认为已经开始逐步成为“民意代表”,而不再是“国家代理人”和“谏言者”。但是,建议议案的动力机制与投票行为的动力机制的差异性提醒我们,那些更积极提出议案建议的人大代表并不更倾向于以投票行为来表达不同意,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仍然不过是扮演了“谏言者”的角色,甚至是“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即便近年来人大代表履职更加积极,但是,人大代表的多重身份的交叉可能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参考文献:

- 蔡定剑,1992,《中国人大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2,《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
- 何俊志、刘乐明,2013,《全国人大代表的个体属性与履职状况关系研究》,《复旦学报》第2期。
- 何俊志、王维国,2012,《代表结构与履职绩效:对北京市13个区县的乡镇人大之模糊集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 黄卫平、唐娟、邹树彬,2003,《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深圳人大代表竞选现象解读》,“2003年中国经济特区论坛:特区发展与国际化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林慕华、马骏,2012,《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龙太江、龚宏龄,2010,《论人大代表的利益冲突》,《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
- 桑玉成、邱家军,2010,《从代表议案和建议看代表属性及其履职之效率: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史卫民,2000,《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卫民、雷競璇,1999,《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唐娟,2004,《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王利民,2007,《关于南京市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杨云彪,2006,《从议案建议透视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人大研究》第11期。
- 邹平学,2008,《人大代表专职化问题研究》,陈明明、何俊志主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六辑):中国民主的制度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邹树彬、唐娟、黄卫平,2004,《2003年人大代表竞选的群体效应:北京与深圳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期。
- Bianco, William T., David B. Spence & John D. Wilkerson 1996,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Early Congress: The Case of the Compensation Act of 1816.”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1).
- Campbell, James E. 1981,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ngressional Connection: The Marginality Hypothesis Reconsidered.” *Political Methodology* 7(2).
- Cho, Young Nam 2002, “From ‘Rubber Stamps’ to ‘Iron Stamps’: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Supervisory Powerhouses.”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 2003a, “Symbiotic Neighbour or Extra-Court Judge? The Supervision over Courts by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 2003b, “Public Supervisors and Reflectors: Role Fulfill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in the Market Socialist Era.”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32(2).
- 2009,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ruce J. 2000,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4).

-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2.
- Fiorina, Morris P. 1973, “Electoral Margins, Constituency Influence, and Policy Moder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4).
- Gandhi, Jennifer & Ellen Lust-Okar 2009,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 Guo, Jiguang 2007, “A Study of Deputies in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He, Yuanqiong, Zhilong Tian & Yun Chen 2007,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Nonmarket Strategy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2).
- Herrick, Rebekah, Michael K. Moore & John R. Hibbing 1994, “Unfastening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The Behavior of US Representatives When Reelection Is No Longer a Facto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6(1).
- Katz, Jonathan N. & Brian R. Sala 1996, “Careerism, Committee Assignments, and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1).
-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8,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155.
- MacRae, Duncan 1952, “The Relation between Roll Call Votes and Constituencies in the 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4).
- Mayhew, David R. 1974,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nion, Melanie 1996,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4).
- 2000,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 Perspective: Electorates and Selectorates at the Township Level.”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 2008, “When Communist Party Candidates Can Lose, Who Wins? Assessing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 2009, “Chinese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as an Institution.” APSA 2009 Toronto Meeting Paper.
- 2014a, “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 Local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8.
- 2014b, “‘Good Types’ in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The Selectoral Connection in Chinese Local Congres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0.
- Meinke, Scott R. 2008,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Senate: Revisiting the Effects of Direct Elec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1(3).
- O’Brien, Kevin J. 1988,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form and Its Limit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3(3).
- 1994a,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1).

- 1994b, “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 O’Brien, Kevin J. & Laura M. Luehrmann 1998, “Institutionalizing Chinese Legislatures: Trade-offs between Autonomy and Capacity.”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3(1).
- Rothenberg, Lawrence S. & Mitchell S. Sanders 2000, “Severing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Shir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ong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2).
- Studlar, Donley T. & Ian McAllister 1994,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Australia: Candidate Roles, Campaign Activity, and the Popular Vote.” *Political Behavior* 16(3).
- Sun, Ying 2014,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in the PRC: A Process of Co-op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5).
- Swift, Elaine K. 1987,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Meets the Past: Lessons from Congressional History, 1789 – 189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2(4).
- Truex, Rory 2014,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2).
- Xia, Ming 1997,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3(3).
- 2000,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4).
- 2007,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冬娅)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陈川懋)

责任编辑:闻 翔